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32卷 · 口述类第12卷 · 农村妇女第2卷)

徐勇 邓大才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 32 卷·口述类第 12 卷·妇女类第 2 卷)

徐 勇 邓大才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 32 卷, 口述类. 第 12 卷, 农村妇女. 第 2 卷 / 徐勇, 邓大才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2 (2019.4 重印)

ISBN 978-7-201-14296-8

I. ①中… II. ①徐… ②邓… III. ①农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001 号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 32 卷·口述类第 12 卷·农村妇女第 2 卷)

ZHONGGUO NONGCUN DIAOCHA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琤
责任编辑 王佳欢
特约编辑 王 倩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5
插 页 6
字 数 8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7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中国农村调查》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 勇 邓大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 文	万婷婷	马 华	王 琤	王 勇
王 静	王义保	邓大才	石 挺	卢福营
冯会平	冯春风	朱敏杰	任 路	刘义强
刘金海	刘筱红	汤晋苏	严定友	李海金
肖盼晴	吴晓燕	何包钢	应小丽	张大维
张向东	张利明	张晶晶	陆汉文	陈军亚
赵慧英	郝亚光	胡平江	姚锐敏	徐 剑
徐 勇	徐小青	徐增阳	黄振华	彭正德
董江爱	熊彩云			

本卷编辑整理 刘筱红 王 琦 郭艳艳

总 序

2015 年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本院不仅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目标,特别是进行了学术整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调查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中国农村调查是基础性工程。从 2015 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便是其主要成果。

学术研究是一个代际接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农村调查是本院的立院之本、兴院之基。本院的农村调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基于项目调查基础上的个案调查(1985—2005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改革。延续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的生产功能由家庭所承担,社会管理功能则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我院学者的关注。1928 年出生的张厚安先生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后较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当时其他政治学学者不同,他比较早地关注农村政治问题,并承担了农村基层政权方面的国家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本校其他学者也承担了有关农村政治研究的课题。1988 年,这些学者建立起以张厚安先生为主任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有其研究宗旨和方法。在学术共同体建立之初,张厚安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宗旨。“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这一宗旨对于政治学学者是一个全新的使命。政治学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传统政治学更多研究的是国家制度和国家统治,以文本为主要研究素材。“三个面向”的宗旨,必然要求方法的改变,这就是进行实地调查。自学术共同体形成开始,实地调查便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张厚安先生为领头人的学者就开始进行农村调查。最初是走向农村,进行全国性的广泛调查,主要是面上了解。1995 年,在原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张厚安先生担任主任,由 1955 年出生的中年学者徐勇教授担任常务副主任。新中心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但领域有所扩大,并将研究方法凝练为“实际、实证、实验”,更加强调“实”。这种务实的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注入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我们的农村调查由面上的了解走向个案调查。当时,年届七旬的张厚安先生亲自带领和参与个案村庄调查,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 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这一项目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选择了 6 个重点村和 18 个对照村进行个案调查,参与调查人员数十人,并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相关人员参与的学术调查研究团队。

第二阶段主要是基于机构调查基础上的全面调查(2005—2015 年)。

1999 年,国家教育部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建设。当年,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徐勇教授担任主任。2000 年,中心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

基地成立之前,以张厚安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是一个没有体制性资源保障、纯因个人兴趣而结合的学术共同体,有人坚持下来,也有人离开。成为教育部研究基地以后,中心仍然坚持调查这一基本方法,并试图体制化。其主要进展是在全国选择了二十多家机构作为调研基地,为全国性调查提供相应的保障,并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心是一个有一定资源保障的学术共同体,有固定的编制人员,也有固定的项目经费,条件大为改善,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农村调查根据个人承担的研究项目而开展。这不仅会导致研究人员过分关注项目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易造成调查研究的“碎片化”和“片断化”,难以形成整体性和持续性的调查。同时,研究人员也会因为理念和风格不同而产生分歧,造成体制性的学术共同体动荡。为了改变调查研究项目体制引起的“碎片化”倾向,2005年,徐勇教授重新规划了基地的发展,提出“百村观察计划”,计划在全国选择100多个村进行为期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目标是像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地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石挺先生的鼎力支持。2006年,计划得以试行,主要由刘金海副教授具体负责。最初的试点调查村只有6个,后有所扩展。2008年,在试点基础上,由邓大才教授主持,全面落实计划,调查团队通过严格的抽样,确定了二百多个村和三千多个农户的调查样本。

“百村观察”是一项大规模和持续性的调查工程,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同时它又是一项公共性的基础工程,人们对其认识有所不同。因为它要求改变项目体制造成的调查“碎片化”和研究“个体化”的工作模式,为此,学术共同体再次出现了有人退出、有人坚持、有人加入的变化。

2009年正式启动的“百村观察计划”,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绩:一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每年都要对样本村和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和形式逐步完善,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调查体系。除了暑假定点调查以外,还扩展到寒假专题调查。每年参与调查的人员达五百人左右,并出版《中国农村调查》等系列著作。二是因为是调查的规模大,可以进行充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提供给决策部门,由此也形成了“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就是为决策部门服务,“立地”就是立足于实地调查。这一收获,使中心得以在教育部第二次基地评估中成为优秀基地,并于2010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徐勇教授担任院长,邓大才教授担任执行院长。三是形成了一支专门的调查队伍并体制化。起初的调查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受到严格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为了提高调查质量,自2012年起,研究院将原来分别归于导师名下指导的研究生进行整合,举办“重点基地班”。基地班以提高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为导向,实行开放式教学、阶梯性培养、自主性管理,形成社会大生产培养模式,改变了过往一个老师带三五个学生的小作坊培养方式。至此,农村调查完全由受到专门调查和学术训练的人员承担,走向了专业化道路。四是资料数据库得以建立并大大扩展。过往的调查因为是项目式调查,所以资料难以统一保管和使用。2006年,我们启动了中国农村数据库建设。随着“百村观察计划”的正式实施,大量数据需要录入,并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资料数据库得以迅速扩展。

第三阶段主要是基于历史使命基础上的深度调查(2015年至今)。

农村调查的深入和相应工作的扩展,势必与以行政方式组织科研的现行大学体制发生碰撞。但是已经有一个良好开端的调查不可停止。适逢中国的智库建设时机,2015年,华中

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由 1970 年出生的邓大才教授担任行政负责人。

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并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而是克服体制障碍,进一步改变学术“碎片化”倾向,加强整合,提升调查和研究水平,目标是在高等学校中建设适应国家需要的智库。实现这一目标有五大支撑点:一是大学术,通过以政治学为主,多学科参与,协同研究;二是大服务,继续坚持“顶天立地”的宗旨,全面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争取成为有影响力的决策咨询机构;三是大调查,在原有“百村观察计划”的基础上构建内容更加丰富的农村调查体系,争取成为世界农村调查重镇;四是大数据,收集和扩充农村资料和数据,争取拥有最丰富的农村资料数据库;五是大数据平台,将全校、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农村研究学者吸引并参与到农村研究院的工作中来,争取成为世界性的调查研究平台。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宏大计划,也标志着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全新起步。

独立建制后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仍然将农村调查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工作,且成为体制性保障的工作。除了“百村观察计划”的持续推进以外,我们重新设计了 2015 版的农村调查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一主三辅”。“一主”即以长期延续并重新设计的“中国农村调查”为主体;“三辅”包括“满铁农村调查”翻译、“俄国农村调查”翻译和团队到海外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海外农村调查”,目的是完善农村调查体系,并为中国农村调查研究提供借鉴。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和农民成为现代化的起点,并规划着现代化的路径。19 世纪后期,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俄国,数千人参与对俄国农村调查,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多年。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对华扩张中,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依托开展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调查,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形成著名的“满铁调查”。进入 21 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大国,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中国需要也应有能够超越前人的大规模农村调查。“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设计的。

“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超越了以往的项目或者机构调查体制,而具有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一是政策目的。智库理所当然要出思想,但“思想”除了源自思考以外,更要源自于可供分析的实地调查。过往的调查虽然也是实地调查,但难以对调查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并根据调查提出有预见性的结论。在这方面,19 世纪的俄国农村调查有其长处。“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将重视实地调查的可分析性和可预测性,以此提高决策服务的成效。二是学术目的。调查主要在于知道“是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是事实的描述。但是这些事实为什么发生?其中存在什么关联?这是过往调查关注比较少的,以至于大量的调查难以进行深度的学术开发,学术研究主要依靠的还是规范方法,实地调查难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由此会大大制约调查的影响力。“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的深度学术开发性,调查中包含着学术目的,并可以通过调查提炼学术思想,使其作为一种有实地调查支撑的学术思想也可以间接影响决策。为此,“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在设计时,除了关注“是什么”以外,也特别重视“为什么”,试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底色及其变迁进行类似于生物学“基因测序”的调查。三是历史传承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村正在迅速消逝。“留得住乡愁”需要对“乡愁”予以记录和保存。20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中国农民经历了太多的起伏,农民的历史构成了国家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因此特别关注历史的传承。

基于以上三个目的,“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由四个部分构成:

其一,口述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 20 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其主体是农民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哪部历史记载他们的状况与命运。进入 20 世纪以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成为“政治人物”,尽管还是“小人物”,但他们是历史的折射。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也可以更好地“以史为鉴”。口述史调查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

其二,家户调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必然有其基本组织制度为支撑。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成型的农村庄园制、部落制和村社制,而没有多少人了解研究中国自己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20 世纪以来受革命和现代化思维的影响,人们对传统一味否定,更忽视对中国农村传统制度的科学研究,以至于我们在否定自己传统的同时引进和借鉴的体制并不一定更为高明,使得中国农村变迁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特有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这就是延续上千年的家户制度。家户调查关注的是家户制度的原型及其变迁,目的是了解和寻求影响中国农业社会变迁的基因和特性。

其三,村庄调查。主要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态及其变迁实态。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村庄构成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相比,农业文明的社会联系更为丰富,“关系”在中国农村社会形成及其演变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系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文明多样的大国,关系格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村庄。国家政策要“因地制宜”,必须了解各个“地”的属性和差异。村庄调查以“关系”为核心,注重分区域的类型调查,通过不同区域的村庄形态和变迁的调查,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无为而治”的传统条件下,一个超大的农业社会是如何通过自我治理实现持续运转的;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深度介入的现代条件下,农业社会是如何反应和变化的。

其四,专题调查。主要是以特定的专题为单位的调查,了解选定的专题领域的状况及其变化。如果说前三类调查是基本调查的话,专题调查则是专门性调查,针对某一个专题领域,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以期获得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全面认识 and 把握。

“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工程,它是原有基础的延续,也是当下正在从事、未来需要长期接续的事业。这一事业已有数千人参与,特别是有若干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下和未来将有更多的人参与。历史将会记录下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名字将与我们的事业同辉!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公布了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审结果,我院排名全国第一,并再获优秀。这既是对过往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进一步发展的有力鞭策。为此,本院再次明确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建设全球顶级农村调查机构、顶级农村资料数据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风格,而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攻坚克难,不懈努力!

徐 勇

2015 年 7 月 15 日初序

2016 年 7 月 15 日补记

口述类序

口述是当事人的语言表达。口述调查是通过当事人的语言表达而获得调查依据的一种调查方法,在当下愈来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人类社会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人类不断前行,需要从走过的路寻求启示,于是需要记录历史。历史不仅是客观发展的事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们记录甚至塑造出来的事实。人类为了顺利前行,必须全面、准确、真实地记录历史,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对历史的选择性塑造可以使人获得某种短期效益,但最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因为历史与自然一样,都有规律可循。只有全面、准确、真实地记录或者还原历史,人们才能够科学把握历史规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历史感特别强。在中国,历史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特别重视对历史的记录。传统中国设有专门的史官职位,民间社会也有记录历史的特殊方法。今天,对历史的记录愈来愈全面,有人将国史、地方志和族谱视为记载历史的三大支柱,但还远远不够。口述史因此应运而生。

过往对历史的记录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上层人物为主,二是以文字记录为主。人们经常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何以记录芸芸众生的创造活动?在历史中保留和传承下来的仍然是少数大人物。即使是芸芸众生也热衷于大人物的活动,从而放弃了历史本身。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记录历史的方法主要是文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读书人才能记录历史。读书人读什么书,怎样记录历史则受到人为的约束。因此,由读书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总有一定限度。许多历史事实因此可能被舍弃、遮蔽,甚至塑造。

口述的出现是对历史记录的一场革命性变革。随着社会进步,对历史的记录不再是被垄断,而是发展为一门科学。对历史的记录也不再为大人物主导,那些过去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的小人物也可以因为口述而进入历史。特别是口述可以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和隐秘性,大大丰富以文字记录的历史,从而有利于促进全面、准确、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无数的农民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但长期以来,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之中。即使是在口述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今时代,也很少以农民为口述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巨大遗憾!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传统农民正在迅速消逝,成为“最后的农民”。尽管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历史进步中人的生命和活动则是需要给予充分记录的。如果没有对这些“最后的农民”的历史记载,也许这将成为历史无法挽回的巨大遗憾。

作为一个农村研究机构,除了与其他机构一样,要匆匆往前赶,完成各种任务以外,我们在农村实地调查中也深深感受到抢救农民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们记录农民的历史,口述则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方法。因为对于农民来说,有关他们的文字记录太少了。

农民是以土地为生的人。土地对于农民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是一种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深厚的感情,甚至崇拜。如许多乡村田野都供奉土地神。因此我们所做的农民口述首

先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展开。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有着独特性。一则中国是在一个传统农业文明保持相对完整的状态下一步跨入现代化门槛的,二则中国跨入现代化门槛之后的变迁特别迅速。这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烈度、广度、弯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农民的生活及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世界少有的。

如果从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土地改革、土地集体化、土地承包、土地流转。

土地改革是迈向现代化大门的起点。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主要因子。就中国而言,农民的命运对于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一则中国农民在进入现代化之前,没有如英国一样发生内部演变过程;二则中国传统农民人数太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这一状况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中国政治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现代政党一诞生,就将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作为基础性议题。在中国,土地问题不仅仅是产权问题,而且是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承载着大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子。因此,到20世纪中叶,土地产权改革一直伴随政权的变革,并带来了全面、深入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是历史性的,它将变革引向中国的基础性部分。而这一部分在历史的王朝变更中是从来没有被触及的,因此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如今,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当事人正在迅速走向人生的终点,他们的口述可以让我们对这样一场历史大变革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中叶是狂风骤雨的年代。土地改革完成不久,中国就开展了农业集体化。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民而言,特别新奇。因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而在推动集体化的主政者看来,正是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农民的贫穷。土地改革让农民有了土地,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再次造成农民的贫穷,于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农业集体化,农民的土地、生产,直到生命活动都以农村集体的方式加以组织。集体因此成为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大集体”成为当事人难以遗忘的历史记忆。

在土地集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人民公社,其兴也勃,其废也忽。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得以废除,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得以兴起,并被确立为农村基本制度。土地承包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家庭经营相似,以致有人一度认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历史不会倒退,也难以简单回归。土地承包毕竟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并因为这种承包关系使得土地具有了所有、承包、经营、收益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的产权关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它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保护,也会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带来许多复杂性。当事人的叙说也许与土地关系一样有不少复杂元素。

土地给农民带来生存和希望,也可能造成对农民的束缚。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土地负载过重更是农民贫困的基本原因。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有可能解决农民一时的生存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避免重回贫困的陷阱,而走出土地或许会获得一片新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世代代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寻求新的产业和发展空间。土地流转因此得以启动。流转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入20世纪,由国家主导进行土地确权,并第一次全面深度介入农村产权领域并担负着保护产权的功能,其深刻意义也许还要许多

年才能显现,但它对农民的生活和意识的改变则是无疑的。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农村基础性关系,但并非全部。中国农村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在其中也有不同的状况。我们还将不同领域和以不同人群作为特定的口述对象,更全面、充分、广泛地记录大历史中农民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比如,我们稍后启动的农村妇女口述史调查,就是围绕“关系·惯行视角中的农村妇女”主题,记录农村妇女与家庭、家族、宗族、村庄、市场、国家、政党等的互动、互构关系以及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变迁历程。

当下,口述史调查愈来愈多,我们的口述调查除了特定对象以外,还有以下特点。一是专业性。尽管我们的口述对象主要是农民,但我们的目的是用于学术研究。因此特别注意客观性,以口述事实为依据,避免主观倾向性。二是可分析性。我们的口述调查不是一般的描述事实,更不是讲故事,而是能够从事实中获得发现,其事实具有可分析和二次、多次开发的价值。因此我们设计了结构化的基本调查提纲。三是规模性。学术性开发需要一定的样本数量,我们的口述调查注意规模和比例。考虑中国地域大,不平衡性强,我们的调查尽可能照顾到全国各个区域,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口述调查力求全国农村每个县级单位都能够有所反映。

我们的口述调查从土地改革开始。为此,我们特别请本院初创人张厚安教授做了口述,并作为口述类第1卷导语。一则在于张先生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亲身参与了土地改革,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则在于张先生长期从事政治学和农村研究,具有专业功力和眼光,他的真知灼见具有启发意义。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但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总是有距离。与其他方法一样,口述也有限度。口述对象同样会产生对事实的选择、加工,甚至塑造。小人物与大人物一样,都希望在青史上留下好名。我们在进行口述调查过程中,力求客观、准确、真实、具体,只是所希望的与所能达到的还是会产生距离。但无论如何,农民口述可以为农村农民史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 勇

2016年1月8日

编写说明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历来重视农村调查与研究, 《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是该基地新版“中国农村调查”项目的重要成果, 在付梓出版之际, 特作以下说明:

第一, 口述调查依托基地“百村观察”项目, 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0 多个定点观察村庄和众多非定点观察村庄中,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 选取最合适的对象。同时, 考虑到中国地域大、不平衡性强, 根据抽样原则, 对口述样本相对缺少的省份、县市进行了补充调查, 口述样本覆盖全国各个区域。

第二, 口述调查对象都是亲身经历过特定历史变迁、身体健康、头脑清晰、记忆力较好的老人, 这些人都能完整地口述相关事件。但是由于受访者基本上是 80 岁左右的老人, 受个人经历、记忆偏差等的影响, 受访者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讲述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为客观、真实地展现受访者的叙述, 材料中除对个别明显有误的内容进行更正或注释外, 一般都保持原样。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

第三, 口述调查时全部进行了录音, 调查结束后由调查员将录音一字一句地转换为原始文本, 包括受访者口述时的语气、神情等, 均在原始文本中做了记录。之后在原始文本基础上, 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分阶段整理。本书即是分阶段整理、分地区编排形成的。材料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单位等均为实名, 文字整理基本上采用了受访者的原话, 保留了大量的地方性话语, 有些方言口语化明显、且难以理解的做了相应注释。

第四, 本书中的文字材料、照片、证件资料等, 均获得了受访者的书面或口头授权。凡是从档案馆等机构获得的资料, 均注明了来源。

第五, 对于受访者讲述到的容易引起争议以及有待进一步核实的内容, 在不影响材料完整度和客观性的前提下, 编辑组进行了部分删减, 其他内容则基本保持原貌。

第六, 由于访谈对象提供内容的局限性, 并非所有访谈的栏目都是齐全的, 编辑组未强求统一。

第七, 由于是口述几十年前的历史, 同一个村的老人对同一件事往往说法不一, 对这类问题一般都会按多数人的说法统一, 但少量的不一致无法处理, 但对整体阅读没有什么影响。

第八, 书稿中的受访者一般都有单人照片, 但也有少量的照片是受访者与调研员及他人的合影, 考虑到绝大多数照片都没必要说明, 照片也就没有一一介绍了。

《中国农村调查》编辑组

2018 年 3 月

目 录

CXT20170108CBD	陈碧刁	1
DQJ20170122DJE	丁菊娥	15
DQJ20170123WJH	汪金环	35
DQJ20170123XZE	徐足娥	68
DQJ20170302ZHY	占河玉	90
FHF20170212SGL	尚桂兰	124
FZ20170128LHM	刘宏美	135
GJJ20170125ZFS	张奉生	143
GJJ20170207GAL	郭爱兰	169
GY20170105LXY	李相玉	190
GY20170105WSJ	王暑节	201
HY20170207LJQ	罗菊群	212
LAN20170124WSY	王守英	226
LDY20170122YFL	于凤兰	240
LDY20170201ZQF	周庆芬	253
PXZ20170110HGY	何桂英	271
RXM20170111YYZ	岳友梓	290
WBB20170103XSY	许素云	304
WJZ20170103ZXL	赵心兰	318
WMM20170108SXZ	宋秀珍	330
WSP20170114LQF	刘起芳	343
WXF20170206LMA	陆苗爱	357
YCL20170204JXM	江新梅	369
YCL20170306LHX	雷火香	383
YCL20170307LSX	李三秀	416
YXL20170120WDL	王东兰	441
YXL20170206CYY	崔玉英	471
ZSD20170209DYG	邓玉秀	493
ZY20170204FYL	冯永兰	502
ZY20170206LYL	李彦兰	515
ZZY20170121LJZ	刘洁珍	527
附录 口述调查小记		539
授权说明		582
后 记		583

CXT20170108CBD 陈碧刁

调研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冠山社区

调研员:陈新泰

受访者出生年份:1936 年

首次采访时间:2017 年 1 月 8 日

是否有干部经历:否

是否生育:是



受访者结婚的时间节点、生育子女的具体情况:1954 年结婚;1955 年生第一个孩子,共生七个孩子,五女两男,一个男孩夭折。

现家庭人口:2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子女赡养

受访者所在村庄基本情况:冠山,宋代已有十余小村,元代渐并成村,因北枕神山,林茂石奇,取其“秀甲邑中群山”故名。乡中贯长街,状若鱼脊,别名“冠陇”。地处韩江下游,东依澄海市区,西南临韩江,北枕石头山、神山等山。地域面积 5.6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14500 多人,现属澄海区澄华街道。

冠山钟灵毓秀,山如彩屏,水似玉带,境内的神山风景区集儒、释、道于一体,熔古今文化于一炉,闻名遐迩的神山十八胜景宛如颗颗璀璨明珠,散落于冠山的山水之间,构成一幅水色山光的国画。

冠山历史悠久、才俊辈出,历为名儒硕彦驻足之所。自宋以降,卢侗、张会宗、周宗礼、许瑶、洪肇基、杨鲁等名宦,灿若星河,其文治武功,彪炳青史;当代革命烈士许包野,革命家、教育家许杰、罗列等俊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现代化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旅居美国的纳米材料科学家卢云峰教授等英杰不懈于人类事业的进步,令冠山增色增辉。

冠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昔在清代就有先人扬帆世界各地,艰苦创业,拓展工商,成果骄人,造益桑梓,冠山遂有侨乡美誉。20 世纪 50 年代,冠山的平整改土及精耕细作的农业,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陶铸等领导及全国 22 个省、市代表团先后到冠山参观、指导工作;冠山“大潭乌鱼”等富饶物产和“赛大猪”等乡土特色鲜明的民俗风情令冠山频添魅力。

改革开放以来,淳朴勤劳、心灵手巧的冠山人以毛织业等家庭工贸业发展经济,其产品远销国内外;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让冠山人注重文化建设;历史丰厚、未来辽阔的冠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谐发展的新景象。

受访者基本情况及个人经历:陈碧刁老人于 1936 年出生,娘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全部去了海外,哥哥在泰国,弟弟在新加坡。剩下老人和老人的奶奶在家里。

老人 1954 年结婚,1955 年生第一胎,是个女孩。共生七个孩子,共育有五女两男,一个男孩夭折。

老人现在和丈夫住在一起,儿子在其他区任职,不住在村里。老人靠儿女赡养。老人信仰佛教。

一、娘家人·关系

(一)基本情况

我叫作陈碧刁,女,1936年出生,今年八十一岁,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冠山人。我娘家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我,我在家里是排第二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给我起的,我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给我起的,我就这么叫着,我也不懂有什么含义。哥哥弟弟的名字也是我爸起的,我也不懂有没有按辈分起。

以前我们家是没有田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吃华侨的。我爸妈很早的时候就去泰国了,我大哥在泰国,我弟弟在新加坡,我到现在八九十岁了都是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当时我奶奶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在服侍奶奶。因为兄弟在番(国)外,我当时本来也打算去番(国)外的,但是因为有一个奶奶没人服侍,我就在家里服侍奶奶。

土改的时候我的成分是华侨工人,家里没有兄弟姐妹被人家抱养。我是十八岁的时候嫁过来的,我老公当时也是无产阶级,都是在耕别人的田,土改的成分是属于贫农,不是雇农,雇农是要很穷的才是雇农,我老公当时家里就他一个人而已。

我结婚之后生了七个孩子,五个女孩,两个男孩,但是一个男孩夭折了。我生第一胎是个女儿,我十九岁时生的她。

(二)女儿与父母关系

1.出嫁前女儿与父母关系

(1)家长与当家

我爷爷当时去了暹罗^①后,就娶了国外的老婆,国内只剩下奶奶。奶奶就是家里的家长,家里的财产也是我奶奶管理的,当时我哥寄钱过来,就是我奶奶在收的。

(2)受教育情况

我们当时是日本(侵华)时期,没法读书,等到十四岁,要去读一年级太害羞,去报二年级,读两个半月而已,就被队长叫出去工作。他们就说他们家人是华侨要叫她出来做工。当时一个学期两块钱的,是在学校里的。我兄十五岁就去番外^②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三岁,我们在那边是有一个爷爷娶了的国媳妇,当时是国外的奶奶过来叫他去他就过去的。他当时在这边过去也是没读多少书,去番外就去做工人,没读书的。我兄当时寄钱还不会写信啊。

(3)家庭待遇及分工

他们去番外之前,家里不会因为重视男孩而忽略我,那个时候我爷爷、奶奶都很疼我,不会重男轻女的。我太奶奶就会重男轻女,那个时候买一个油粿,她就弄一块小小的尖尖给我,我兄就分到一块大的。她就说女孩别人家的,不能给她太多。我爷爷、奶奶、我妈都不会重男轻女的。我那时还小,添饭都是奶奶舀给我们吃的。过年给压岁钱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拿给我们兄弟姐妹的都一样,以前家里都没有几块钱的,都是几毛钱而已。

(4)对外交往

那个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就是我们的那些老姨、表姑而已。那个时候要吃饭全家人都在一

① 暹罗,泰国旧称。

② 番外,即国外,正琼人昔日称域外为番。历史上有众多琼人,漂洋过海,到域外谋生。